

《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

陈曦◎著



中華書局

《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

陈曦◎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陈曦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7

ISBN 978 - 7 - 101 - 05760 - 7

I. 史… II. 陈… III. 史记—研究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1203 号

-
- | | |
|------|---|
| 书 名 | 《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 |
| 著 者 | 陈 曦 |
| 责任编辑 | 周 旻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¾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
| 印 数 | 1 - 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5760 - 7 |
| 定 价 | 20.00 元 |
-



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材卷

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材编审委员会名单

主任：陆文虎

副主任：朱向前 章其平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孔小玉 刘敏 刘大为 朱向前

徐福芦 张方 张婷婷 李双江

陆文虎 南东风 袁武 章其平

黄定山 黄献国 黄婉滢

序 一

《史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极富文化历史知识,又具有作者非常深刻的思想体验的典籍。鲁迅曾说“读经不如读史”,如果将儒家的“五经”与《史记》相比,这一点可以看得特别清楚。司马迁很热爱先秦的文化传统,对先秦的许多思想文化大师非常敬仰,但他又从来不对任何一家僵化地迷信与崇拜,而相反是表现了他极其可贵的对传统、对权威的某种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因而读《史记》,可以让一个人的思想更解放,更进一步地思考问题。陈曦同志研究《史记》十多年,写成了《〈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一书,从许多方面对司马迁的思想特点与其对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的贡献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例如,她将司马迁的《史记》置于周汉文化的大背景下,探索了司马迁在文、史、哲等不同文化领域熔铸百家而又独出机杼的创造成果;探索了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下,能依然坚持对先秦百家思想精华的吸收,坚持其对先秦士风追踪向往的精神。为此,她撰写了《司马迁与孔子——两位文化巨人崇古意识之比较》、《司马迁与墨学的精神关联》、《史记的幽暗意识》等文,揭示了司马迁的思想来源及其个性极强的文化创造成果。

陈曦同志读书很细,能发现许多别人不太注意的问题,并由此加深、加广地开发下去,将《史记》与司马迁所利用过的先秦文献以及汉初史料进行排比对照,以探索司马迁凝聚在《史记》人物身上的思想内涵,以期进一步走进司马迁的心灵深处,挖掘出

前贤未曾指出的蕴藏于《史记》当中的幽微旨趣。例如她对孔子、子路、子贡、范蠡、伍子胥以及李斯、项羽等历史人物所做的分析就是这方面的很好说明。陈曦同志很注意凭材料说话,从不做架空的想象,也不追求名词术语的玄虚,例如《巫蛊之祸与司马迁卒年问题考论》、《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等就是这种从文献资料出发而撰写的考据文章。真正做到了傅斯年所说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陈曦同志是一位年轻的学者,更首先是一位优秀的传授古代文史知识的教师。她有很好的学术修养,有对学生、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与热爱,同时又有很好的口才,是一位很称职的老师。记得当年博士论文答辩,她用极其准确、流利、快速而又生动、悦耳的言辞说到二十分钟时,在场的答辩委员与旁听的来宾都惊异、兴奋地鼓起掌来。时间已经过去六年了,陈曦同志还像当年上学时一样地勤学善问。她总结她的近些年研究问题的经验说:她是“借鉴‘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习惯按照时间顺序,列出不同时期关于该人物或事件的种种记述、解释及分析,从材料的排比对照中,考索司马迁对史料的处理,并以此作为窥视《史记》思想、艺术的极佳窗口”;她说她“也借鉴童庆炳、李春青等先生所倡导的‘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不是孤立地研究《史记》的‘文学价值’,而是多方面地把握司马迁的价值理念、人生体验、文化心态等,以构建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文化语境,以此为前提来观察司马迁的文学贡献”。她的这本《〈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就正是用这些方法写出来的。’

我是一个《史记》爱好者,从1959年开始系统读《史记》,到现在已经四十七年了。我从《史记》中学到了许多认识问题的方法,但也有许多问题至今未得其解。这回在阅读陈曦同志书稿

的过程中长了不少知识,愿陈曦同志在今后的科学研究中不断提出新见解、做出新贡献,“起予者,商也”。

韩兆琦

2006年11月27日

(韩兆琦先生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

序 二

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学术园地,即将绽放一朵奇葩,也就是在你的书案上,将要置放一本具有鲜活新思想、新思维、新视角的学术论著。这本书命题为《〈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作者陈曦是一位中年女学者,是《史记》研究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的高足,现任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我与韩兆琦先生过从甚密,因此与陈曦早就相识,她的工作单位与我的工作单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又是近邻,平素有一些学术联系,偶尔也有过学术问题的交流,也可算是忘年交吧。陈曦把她积年撰写的《史记》论文结集出版,在付梓之际,索序于余,这就是本文的由来。

陈曦为人淡定,不事张扬。她平时在交流中涉及学术问题,只谈具体问题,从未透露她个人的治学计划以及出版学术论著的事。她正当中年,作为女性,在工作之外,还要承担生活的重负,系统读书、研究要挤时间,做出成绩很不容易。当她把洋洋数十万字的书稿清样送来时,让人有些惊愕。尤其是读完书稿之后,更使人油然而敬。全书二十余篇论文,所有的论题和本书的书名一样,看似平淡,有些是老生常谈,可是在陈曦的感悟与表述中,别具一番内涵深意,发人所未发之言,出奇、出新,表现了作者刻苦用功、呕心沥血的心路历程。毫无疑问,《〈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是在热门课题研究中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开拓了《史记》研究的新领域,所以是《史记》学术园地的一朵奇葩。其极具个性的鲜明特点,着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推陈出新,发人所未发之言。

这一特点以论集中探索《史记》文化渊源的一组文章最为突出。这一组文章主要有三篇:《司马迁与孔子》,《司马迁与墨学的精神关联》,《〈史记〉的幽暗意识》。《司马迁与孔子》探讨了两人思想的渊源与承传关系。作者认为,两位哲人对“天”和“天命”都一再有所称引,表明他们头脑中“都有宗教意识的地盘”,但是“支撑他们从事艰苦卓绝的文化事业的精神源泉”,以及审判历史、批评现实的终极标准,都不是来自“超验、神秘的上天”,而是“从茫茫历史中积淀而成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司马迁和孔子,两位哲人的思想都是来自于对历史认知的升华,而不是来自于先验的顿悟,所以两人都是历史学家,重视历史,叙写历史,从而两人“均树立了人文色彩浓郁的崇古意识”。在这里,作者使用的“崇古意识”,不是复古思想、倒退意识,而是指“历史信仰”,要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拈出改变现实、创造美好制度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作者挖掘出司马迁写《史记》的理论基础。

作者并未止步。司马迁和孔子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历史时代不同,两人的崇古意识必然不同,思想内核和意义有着明显的差异,作者做了充分的阐释。孔子崇古的内核是着重于古代的政治制度,其内容有两个层面。其一,对夏商周三代圣君贤臣的礼赞,从而提倡“仁义”学说;其二,对西周礼乐制度的推崇,从而提出“复礼”的主张。“仁”与“礼”的关系,“仁”是“复礼”的手段,“礼”是“仁”的旨归。所以孔子的政治主张就是“克己复礼”,把复礼作为治世的良方。司马迁的崇古意识则体现为一种多元吸纳而又自成一格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立场。其精髓是充分吸纳圣君贤臣独具的道德、伦理,以及先哲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与忍辱负重的奋斗精神,用以激励自己的人生,落实在自己从事的文化事业中,树立起一个追求史学独立品格的光辉典范,用以抵制西汉时盛行的媚附皇权的庸俗哲学。

《司马迁与墨学的精神联系》,作者一反前人所谓司马迁

“尊儒而重道，墨盖非其所喜”（孙诒让语）的说法，认为司马迁十分重视对墨学精义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史记》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夏禹、晏婴等，被涂抹上了一层浓郁的墨学色彩。其二，司马迁多方汲取了墨学的若干合理内核，包括鲜明的平民意识、突出的功利精神等，但司马迁的游侠观却与墨学并无关涉。

《〈史记〉的幽暗意识》，探讨司马迁对先秦儒法两家关于人性善与性恶主张的吸收和扬弃。“幽暗意识”是借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学者提出的一个术语，意思是指对人性负面恶行的正视与省悟。作者概括司马迁幽暗意识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正视人类合理欲望，不认为追名逐利是恶；其二，高扬人类至善本性，不认为追名逐利是最高价值；其三，对“伪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简括地说，司马迁的幽暗意识，对儒家的性善说并不照单全收，而对法家也不全盘否定。传统归类荀子为儒家，但他的性恶论是法家的理论基础，他的两个最有出息的学生韩非、李斯是先秦的法家代表。《〈史记〉的幽暗意识》重点是探讨司马迁对性善说的吸收。

上述三篇文章构成作者对《史记》文化背景的探索，试图构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语境，也就是探讨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可是在学术界以往的探讨里，基本停留在表层的论述中，有的认为司马迁崇儒，有的认为司马迁尊道，有的则说司马迁好奇、驳杂，儒、墨、名、法、阴阳、道，兼收并蓄，司马迁父子的《论六家要旨》自己就这么说了。但对于司马迁怎么融会贯通，往往说不清楚，也很少有深层次的分析。作者的这一组文章，从不同层面探讨司马迁对先秦思想的吸收与承传，别开生面，呈现了司马迁思想的崭新面貌。作者在《司马迁与孔子》一文的结语中自信地认为她“真切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发现和感悟，“靠近了那两颗伟大的心灵”，“并对他们的思想有了似乎较为贴切的把握”。作者这组论文所取得的成就，所

闪现的思想光芒,展现出的新思维,可证作者的自信是有充分理由的。

其二,论从史出,在探微发隐中出奇、出新。

作者考察由“巫蛊案”引发的戾太子之死与司马迁卒年考论两大学术问题,运用探微发隐的方法,做出了典范性的贡献,值得细细评说。

所谓“论从史出”,指的是立论要有依据,不说空话,论点要有论据支撑。由于古史研究常常苦于文献不足,所以强调“论从史出”,要求治学者细心读史,探微发隐,沙里淘金,下一番考据的功夫,找出论据。这也是治学者见功力的地方。如果治学者对自己要论证的问题下的功夫不够,只依据似是而非的材料,或者抓住一条孤证就大做文章,用推论代替考证,即便是学术大家,也免不了跌跟头。例如考证司马迁的卒年,以《报任安书》作为司马迁绝笔文字来推论司马迁的卒年,就陷入了主观推论的泥潭。《报任安书》中有怨言,算是一条孤证,但无法证明是司马迁慷慨赴义的绝笔书。再说《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也未能确定,学术界有太始元年、太始四年、征和二年、征和三年四种说法。《报任安书》中有“会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的话头,论者于是推定任安死于征和二年十二月。因汉法大辟罪人在季冬。东汉卫宏《汉旧仪注》有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的话头,论者就把假定的任安死于十二月反过来推定《报任安书》作于十一月,由任安之死牵连出司马迁下狱死。由因证果,以果证因,循环往复,违反了逻辑法则,不是由甲证乙、由乙证丙的单向延伸,而是由甲证乙,又由乙证甲。推理论证必须在已知的条件下延伸才符合逻辑,而因果论证,循环推理,其前提均是假设,无法单向延伸,只能循环,所以不符合逻辑。《报任安书》虽有怨言,但不是绝笔书,说它是绝笔书就是假设。涉及巫蛊案的罪人,属“斩立决”,并不在季冬。说任安死于季冬亦是假设。用假设证假设,互为因果,当然是荒谬的。陈曦在

《巫蛊之祸与司马迁卒年问题考论》一文中,从《汉书·刘屈氂传》、《资治通鉴》汉纪征和二年发现任安之死不在征和二年十一月,而是与放走戾太子的丞相司直田仁一起在七月被腰斩。这一记述斩断了循环论证的一个链条,那么循环论者构建的推论大厦必然呼啦啦倒塌。作者的结论:“《报任安书》并非作于征和二年,它与司马迁之死是毫不搭界的。”完全合于逻辑,因而中肯有力。

《汉书》与《通鉴》载述的任安之死,明白无误,只是读史者粗心放过,于是走了许多弯路。如果说陈曦指出了任安的确切死日,表现了她的读史细心,还不足以证明她“探微发隐”的功力的话,那么陈曦对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这一史料的发现及其细微论证,足可以证明其治学的用力之勤,思维逻辑之密,在“探微发隐”的方法上做出了典范意义的贡献,作者的功力和识见,于此可见。

众所周知,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即使是晚年,他对于全国局势的把握也不失清醒,他在临终前的两年,颁布轮台诏令,为昭宣中兴奠定了政治转机的基础。如此英名有为的君主怎么会在一个小小权臣江充的误导下演出巫蛊之祸的悲剧呢?巫蛊之祸的死难者有皇后、太子、皇孙、丞相等皇亲贵胄、公卿大臣,更有数万名吏卒,差点颠覆了帝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汉武帝、戾太子这一对父子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大概是文献不足,学术界很少论及,成为千古悬案。陈曦发现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这一史料,运用“探微发隐”的方法,从《公羊传》与《穀梁传》的思想倾向入手,论证了汉武帝、戾太子两人不同的政治路线,为解决这一千年沉寂的悬案做出了可喜的努力。

汉武帝崇尚“公羊学”,依据《公羊传》宣扬的九世复仇、尊王攘夷外伐四夷,又依据《公羊传》宣扬的“臣无将,将而诛”,用法严苛。而《穀梁传》宣扬“民本”意识与“亲亲之道”,戾太子据以反对汉武帝的强权政治,主张化解仇恨,必欲用武,也必须内政无

忧方可攘夷。戾太子不赞同用法严苛,平反冤狱。于是“群臣宽厚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父子两人的政见既不同,而朝中大臣又各有彼此,于是江充得以乘间而入。作者还认为戾太子继承了《穀梁传》维护礼制的思想,长期恪守为臣之道,尽忠尽孝,这既是汉武帝迟迟不废戾太子的原因,也促使汉武帝后来反思悲剧结局,痛定思痛,引发内心激烈振荡,转向认可戾太子的“守文”,才发布了轮台诏令,“最终完成了政治上的‘守文’转向,避免了亡秦悲剧的再次上演”。本文立论新颖,分析透彻,论据充分,很有说服力。这篇恢宏大论,起源于对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这一细微史料的发现。因为作者注意到,汉武帝慎重其事地发布诏令让太子刘据学习《公羊传》,要他继承自己的政治路线,而太子却对《穀梁传》感兴趣,“私问”,即个人爱好。诏令与私问形成强烈反差,作者敏感地捕捉了这一反差,经过细密的论证,全过程都是“探微发隐”,而且不对《公羊》与《穀梁》两传的思想旨趣下一番功夫,是做不到的。

其三,纵横比较,在周汉文化的大背景下感悟司马迁的创作心声,开拓了《史记》研究的新领域。

作者题书名为《〈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可归列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史记》的艺术探索;二、《史记》人物实例分析;三、《史记》的文化探索。作者探讨的这些学术问题,以及本书书名,看似平淡,而内涵却别具深意,对于作者的研究方法有提示作用。本书书名中,“周汉”这一术语概括了《史记》所载三千年历史的断限范围,因此《史记》本身就是周汉文化的组成部分。《史记》是小题,“周汉文化”是大题。作者将小题与大题对接构成书名,其内涵就是把《史记》置放在周汉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作纵横比较研究。纵横比较与重视文化发展大背景,是作者宏观研究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极具个性化。作者对这两个元素得心应手的运用,充分展现了她的新思维与新视角。作者在研究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把古

今中外的文化发展都用为感悟司马迁创作心声的大背景。在这一大背景的平台之上,作者将《史记》与《三国演义》、《史记》与古代正史传记、《史记》与蔡东藩的《前汉演义》作比较研究,并将司马迁与世界东西方哲人,如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以赛亚·柏林,法国的安德列·莫洛亚,德国的卡尔·雅斯贝斯,美国的欧文·斯通,俄国的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做比较。原本晦暗、枯燥的史事,模糊、混沌的思想,一经对比的眼光扫描,霎时就变得清新、生动,历史的真相、思想的真谛,也因而得到显示。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作者笔下变成了新课题,展现出了新思维,因而取得了创新的极大成功。

下面,再对《史记》的叙事艺术、写人艺术、虚构问题略作述评,看看作者带给我们哪些新思维。

《史记》的叙事艺术,作者讨论了《史记》的隐含叙述与战争叙述两个课题。所谓“隐含叙述”,就是创作者寄寓在文字之外的“微情妙旨”。作者分析了《史记》中大量的以曲折形式表达作者主观情志的隐含叙述,其方法有四:一是调整叙述节奏,二是插入寓言式的叙述,三是移位叙述,四是反讽修辞的使用。这些手法,是司马迁对先秦隐喻性叙事观念的热情响应与积极发挥。作者指出:只有了解《史记》的叙事策略,才能深入司马迁的心灵深处,感受《史记》如冰山般的威严。关于战争叙述,作者从军事文化的角度切入,揭示了“崇儒”与“爱奇”是《史记》战争叙述的两大基石。学术界以往探讨《史记》的叙事艺术,着重文学技法的揭示,陈曦的探讨,首次触及司马迁思想的承传,揭示了司马迁对人类历史、社会政治、现实人生等多方面的思索,把《史记》叙事艺术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平台,超越了前人的成就。

《史记》的写人艺术,是文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关于写人技巧、形象塑造的话题,似乎已达题无剩义的程度,许多论文是叠床架屋炒剩饭,突破前人成就很难。陈曦的探索与人物实例分

析,独辟蹊径,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史记〉传记艺术溯源》,作者系统地考察了先秦文献在传记体例、写人意识及写作技巧等方面提供给《史记》以艺术滋养,从而揭示了《史记》传记文学的辉煌绝非空中楼阁,而是一种继承和发扬。《〈史记〉的悲剧艺术》,将《史记》置于中外悲剧文学的广阔天地,考察了司马迁怎样选择和塑造悲剧人物,揭示了司马迁与儒、道两家迥然不同的悲剧审美观。

在《史记》人物实例分析中,着重选择先秦人物,并特意将《史记》原文与司马迁所利用过的先秦文献作了排比对照,得知司马迁绝不照搬先秦史料,而是常常在一些关键地方,有意弃《左传》、《国语》、《论语》、《国策》等现存材料而另采他说,甚至干脆独创新说,目的是为了传送自己的心声。没有先秦文献依据,完全是司马迁自己独创的李斯、项羽,作者要阐明的重点也放在阐发司马迁的心声上。总之,作者对司马迁写人艺术的探索,以及人物实例分析,重点放在揭示创作者司马迁的心声上,目的是进一步走进司马迁的心灵深处,挖掘出前贤未曾指出的蕴藏于《史记》中的幽微旨趣。可以说,这是对创作者更深层次的思想研究,作者立意高远,故能创新,值得肯定。

关于《史记》记事的真实与虚构,也是文史两界关心的热门话题,至今论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史记》实录,记事文直事核,是历史,没有虚构。有人认为《史记》人物传记,已达到典型化的艺术境界,是短篇历史小说集,甚至郭沫若也说过《史记》人物传记是历史小说。目前占上风的意见认为,《史记》主干实,枝叶虚,只有细节的虚构,是合理的“遥情想象”,并给予了“艺术真实”的理论标签。陈曦运用文化发展的大平台和纵横比较方法,把《史记》中的历史虚构,它的成因和作用,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作者在《〈史记〉的历史虚构》一文中认为,《史记》只有细节的虚构,它与历史记载的真实是浑然一体的。分别将《史记》与蔡东藩的《前汉演义》以及《三国演义》做比较,指出传统的虚实理论,将

作家主体意识创作的历史文学,人为地分割为真实与虚构两个部分,既误导了对《史记》中虚构的认识,又误导了历史小说的发展。作者在对比研究中发现,《史记》中含有细节虚构的篇章并不是《史记》中文学性最强的篇章。《前汉演义》力图避免虚构,却又摆脱不了虚构,而文学性最强的部分,又恰恰是含有虚构的部分。这说明虚构可以增强史传的文学性,但却不是唯一的手段。《三国演义》不回避虚构,未受传统虚实理论的干扰,成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作者引入了泰戈尔“历史情味”的概念,主张人物传记与历史小说,作家的主体意识,都要注重“历史情味”的酿造。《史记》与《三国演义》共同点是都蕴涵作家“历史情味”的酿造,不同点,《史记》的文学创作是不自觉的,《三国演义》是完全自觉的。一般演义小说之所以未能超越《三国演义》,原因之一便是传统虚实理论的误导,失去了“历史情味”的芬芳。作者对“历史情味”概念的引入和运用,使人耳目一新。

作者在《〈史记〉与历代“正史”传记》一文中,以中国古代文、史两家的分合变化为背景,指出司马迁是在文史不分的背景下,重视自我表现,挖掘传主复杂的人性,运用小说技法刻画传主形象,“在写人艺术方面奏出了许多暗含现代传记的精彩乐章”。司马迁之后,在文史异辙的背景下,作家主体意识衰退,人物形象干瘪,语言枯淡无华,史传人物失去了文学性,故而无人企及司马迁。

《史记》是大家熟悉的历史名著,对《史记》的研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个热门课题。粗略统计,自1978年以来,每年都有百余篇《史记》学术论文发表,二十余年间积数有两千多篇,出版的专题学术论著130余部,论文论著作者1200余人。当前《史记》研究的学术平台,处于一个高端发展的态势。如此众多的作者,又在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园地,陈曦可谓脱颖而出,她的《〈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给我们带来了新思维,开拓了《史记》研究的新领域,引领后继者探索《史记》每一篇创作背后

作者的心声,这一新领域有着广阔的天地,有待作者和《史记》爱好者共同努力。学无止境,人生有涯。中青年学者的创造思维,是“史记学”发展的希望。祝贺陈曦,祝贺《〈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的问世!

是为序。

张大可

2006年10月30日

(张大可先生系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